

中国历史故事丛书

北魏末年 各族人民起义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

顾奎相 陈 浣 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沈阳

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

顾奎相 陈 澹 编

•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•

字数：28,000 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 $\frac{1}{8}$ 插页：1
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90·47 定价：0.16元

毛主席语录

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从秦朝的陈胜、吴广、项羽、刘邦起，中经汉朝的新市、平林、赤眉、铜马和黄巾，隋朝的李密、窦建德，唐朝的王仙芝、黄巢，宋朝的宋江、方腊，元朝的朱元璋，明朝的李自成，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，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，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，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，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，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

目 录

一、残酷统治.....	2
二、沙门首事.....	10
三、七镇烽火.....	19
四、前仆后继.....	29
五、遥相呼应.....	38
六、业绩千秋.....	47

我们的祖国，是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。

自古以来，我国各族人民就劳动、生息在辽阔富饶的祖国土地上。他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巨的生产斗争中，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。

北魏末年，在广袤（音冒mào，广大）的北国大地上，汉、鲜卑、氐（音低dī）、羌（音枪qiāng）、匈奴、敕（音斥chī）勒等各族人民，不堪忍受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高举农民革命的战旗，反抗北魏王朝的残酷统治。当时，东自浩瀚的渤海之滨，西至狭长的河西走廊，北起漠漠的内蒙高原，南到滔滔的黄河两岸，到处燃烧着农民起义的烽火。起义的各族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横扫了大大小小的贵族、官僚、地主，滚滚的革命洪流冲击得北魏王朝摇摇欲坠，各族人民谱写了一曲团结战斗的胜利篇章。

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，为推动历史的发展，促进各民族的融合留下了不可

磨灭的业绩。

一、残酷统治

北魏（公元三八六年——五三四年），是我国北方境内少数民族鲜卑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。

鲜卑拓跋部，很早居住在今天嫩江流域的兴安岭附近。最初是由三十六个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，过着游牧的原始生活。后来逐渐南迁，这个部族也随着发生变化。公元二五八年，拓跋部南迁到盛乐（今山西大同市西北）地区，和中原地区开始通商，不断吸收汉族文化，从此使这个民族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。到拓跋猗（音衣 yī）包统治拓跋部的时候，迁徙十万户入居代北（今山西、河北北部、内蒙南部一带），开始了定居生活，初具奴隶制国家的规模。公元三八六年，拓跋珪（音龟 guī）在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建立了包含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封建政权。打这以后，北魏政权又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，先后灭掉了后燕、夏国、北燕和北凉等封建割据政权，统一了长期陷于四分五裂的北方。

“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

较高文明所征服，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。”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地区后，起初是“胡汉分治”，公元四七一年至四九九年，孝文帝拓跋宏统治时期，为发展北魏的封建经济，巩固其反动统治，继承了魏晋的各项制度，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。首先颁布了均田令，实行计口受田，不仅男夫、妇人可以受田，还规定奴婢和耕牛也可以受田。后来，孝文帝又把国都由平城迁到洛阳，为了适应他们的统治，采取了一些使鲜卑人汉化的措施，改革鲜卑服装为汉服；严禁讲鲜卑话；鲜卑贵族通通改为汉姓；废除鲜卑族的官制、法律、礼仪、典章等旧制度，完全实行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等。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，对于北方社会封建经济的发展，对于北方各民族间的融合，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鲜卑族汉化的过程，也就是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的过程。

北魏王朝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统治，到六世纪初叶，政治日趋腐败。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，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，胃口越来越大，无止境地盘剥和压榨各族穷苦人民，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激化。

特别是到了公元四九九年，拓跋宏死，宣武帝子

恪（音课kè）即位，均田法等各项改革措施开始遭到破坏。原来均田法规定，地方官吏授予职分田，刺史（一州的行政长官）十五顷，太守（一郡的行政长官）十顷，治中、别驾（刺史的属官）各八顷，县令（一县的行政长官）、郡丞（太守的属官）各六顷，如果被调离或罢官，须将田亩移交接任官吏，不准私自买卖，凡私自出售者要受到法律制裁。另外，还规定：“职分公田，不问贵贱，一人一顷，以供刍秣（音除末chúmò，喂马的草料）”。这些禁止买卖的公田，从“宽以摄下”的宣武帝上台后，“始以永赐，得听买卖”。再就是均田中的“露田”（耕田），按法律规定，也不允许买卖，但在地主、酷吏催租逼债面前，纳不起赋税的农民为了活命，“率多货卖田业”，这就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兼并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。

一小撮皇亲国戚、达官显宦凭借手中的权势，趁机掠夺土地，强占劳动力，把各族人民推进到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的痛苦深渊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：“帝族王侯，外戚公主，擅（音善shàn，独占）山海之富，居川林之饶，争修园宅，互相竞夸。崇门丰室，洞户连房，飞馆生风，重楼起雾，高台芳榭（音卸xiè，台上的屋子），家家而筑，花林曲池，园园而

有。莫不桃李夏绿，竹柏冬青。”这段描写，多么生动的显现了当时封建统治者奢华无度！例如，范阳卢氏、清河崔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、赵郡李氏、渤海高氏等累世豪门大族，都霸占着不可数计的肥田沃野，奴役着成千上万的部曲和奴婢。至于鲜卑贵族所霸占的田园和奴婢，较之汉族的名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例如咸阳王元禧（音喜 xī）有“姬妾数十”，“奴婢千数，田业盐铁，遍于远近”，当时，从京城洛阳到各州、郡、县，都遍布他的田地和牧场。上行下效，士族官僚崔暹（音仙 xiān）挖空心思掠夺土地，把他的家一分为三，住在三个县，“广占田宅”。华州刺史杨播以“借”为名，大肆强占民田。他的弟弟杨椿不但掠夺百姓的土地，还招募贫民盗种牧田多达三万余亩。各级官吏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“占夺民田”和拉夫抓丁，使土地高度集中，广大贫苦农民丧失生产资料，无以为生。

除此以外，吏治的腐败，赋税的繁重，高利贷的盘剥，使各族人民更是苦不堪言。当时，在朝的官吏明目张胆地卖官鬻（音育 yù）爵，贿赂公行。如吏部尚书元暉，“纳货用官，皆有定价，大郡二千匹（绢），次郡一千匹，下郡五百匹”，其余的官职也

都象商品一样，按着等级定出价格，准备随时出售赚钱。人们形象地称吏部是卖官的市场，称那些最贪婪的官吏是“饿虎”、“饥鹰”、“大贼”，可见人民对他们是多么痛恨！公元五一九年，北魏政府实行“停年格”，就是不看求官人才能的大小，完全是论资排辈、按次序补官。比如在朝专权的大宦官刘腾，“公卿属请，唯在财货”。元义得志，“贪吝宝贿，与夺任情”。

在朝廷的贪官污吏靠出卖官爵，接受贿赂为职业，而各州郡的刺史、太守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也都巧立名目，“聚敛无极”。昏庸腐朽的胡太后专权的时候，“嬖幸(音闭幸 bīxìng, 宠臣)用事，政事纵弛”，各级大小官吏“率皆贪污之人”，朝廷规定征收户调绢每匹长四丈，人民本来就力所难支，但贪官们还嫌不够劲，拚命加大尺码。如相州刺史奚康生规定每匹绢长七、八丈，不然就拒不收纳。田租的征收也是如此，地方官为了最大限度地鱼肉人民，用大斗、重秤征收租米，这时用的斗、秤是过去的二倍，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又骤然增加负担一倍或两倍以上。本来就紧束腰带、饿着肚皮的人民，又要多拿一至二倍的赋税，他们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。

为了活下去，数以万计的穷苦百姓，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，这样，使他们枯瘦如柴的脖颈又套上一条死亡的锁链。当时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二百二十五，一些官僚地主就是靠放高利贷聚敛财富，成为家资万贯的富翁。世家大族清河崔光伯靠放高利贷使“绫绢钱布、匱篋（音潰切kuīqiè，装东西的箱柜）充积”。

又由于北魏王朝穷兵黩武、连续举兵进犯南朝，人民负担的兵役、徭役也非常繁重。从迁都洛阳后就战祸连年，到宣武帝时，战争规模日趋升级，东自淮上，中经义阳，西至宛、邓，到处都是烽火连天的战场。士兵和军需从各地征发送往前线，“汝颖之地，率户从戎（家家有人当兵），河冀之境，连丁转运”，“细役繁徭，日月滋甚”。被征调服役的士兵在军队里饱尝反动军官的虐待，受尽寒冷、饥饿和疾病的折磨，“死于沟渎（音读dú，水沟）者，常十七八”。繁重的徭役和兵役，使得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。

总之，北魏后期的封建统治者靠着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，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，掠夺劳动力，用卖官卖爵聚敛财富，用繁重赋役搜刮百姓，用高利贷盘

剥人民，将各族劳苦大众用血汗创造的财富，通过各种渠道流进了一小撮统治阶级的腰包，使他们过着荒淫无耻、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。例如，高阳王元雍，“富贵冠一国，宫室园圃，侔（音谋 móu，相等）于禁苑。僮仆六千，妓女五百”，一顿饭要花钱数万。如此富有的元雍，有的官僚还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河间王元琛经常叫号要拿自己堆积如山的家财去和元雍比富。就是这个元琛，也不知他家金银珠宝有多少，仅“置金井玉罐”，“金瓶银瓮数百口”，远从波斯国购买名马十余匹，“皆以银为槽，金为环锁”；更不知他住的“安乐窝”有多么堂皇，连楼阁上的窗户都是“玉凤衔铃，金龙吐旆（音佩 pèi）”。他曾自负地说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（西晋武帝时一个挥霍无度的大官僚），恨石崇不见我”。章武王元融看了琼楼玉宇，家财万贯的元琛，自愧弗如，十分懊恼，回家后一头倒在床上，三天爬不起来。其实元融的财物并不比元琛少。可见北魏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胃口恶性膨胀到了何等程度，糜烂腐朽到了何等地步！

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和封建统治者成为鲜明对照的各族人民，由于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，“竟弃本生，飘藏他土。或诡名托养，散没人间；或亡命

山藪（音首 sǒu，杂草丛生的湖泊），渔猎为命；或投仗强豪，寄命衣食。”当时广大自耕农民为躲避赋役，纷纷外逃，一是逃往深山野泽，靠打渔、狩猎苦熬艰难的岁月；一是投靠到世家大族的户籍下，成为佃客、部曲。再就是“绝户而为沙门”，沦为寺院地主的依附农民。农民逃散以后，丢下土地无人耕种，结果“通原遥畛（音枕 zhěn），田芜罕芸（音云 yún），连村接阡（音汗 kǎn，巷门），蚕蚀莫食。”看，原野一片荒芜，村村落落，连蚕都没有食吃！农业生产受到如此严重破坏，广大贫苦人民的生活哪里还有出路？

“这种压迫越是暗无天日，农民现在的觉醒就越有力量，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越难阻挡。”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族人民，为挣脱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，斩木为兵，揭竿而起，铤而走险，用武器批判万恶的旧世界。

公元四八九年，在兖（音演 yǎn）州爆发了王伯恭所领导的农民起义；

公元四九九年，幽州农民王惠定率众起义；

公元五〇〇年秋天，齐州柳世明率领农民起义；

公元五一一年正月，在汾州有刘龙驹为首的农民起义……等等。

反抗的烽火遍地燃烧，革命的风雷到处激荡，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暴风雨就要到来。

二、沙 门 首 事

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，首先由沙门（佛教名词，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人）造反揭开了序幕。

这是因为北魏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，除了靠政治上和经济上压迫、剥削各族人民之外，还极力崇奉佛教，用宗教迷信做精神武器奴役人民，豢养一个僧侣地主阶级的同时，使成千上万的下层僧尼过着奴隶般的生活。这些僧尼大众受压迫最深、反抗性也就最大，这就是他们首先发难的原因。

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宗教，它主要宣扬生死轮回、天堂地狱、因果报应的邪说。它胡诌人活着要是做“善”事，安分守己，听凭命运的摆布，死后可以升“天堂”，来世还可以为人，能享荣华富贵；反之，要是行“恶”，那死后就会被打入地狱，受尽磨难，来世也只能穷困潦倒、受苦受罪，甚至不得为人，变成禽兽，被人烹割。列宁说：“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，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

幸福生活的憧憬”。在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里，这种因果报应的思想便具有很大的欺骗性。统治阶级把它视为救命的稻草，妄图以此愚弄群众，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，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，让他们为祈求“来世”的幸福，俯首贴耳地忍受统治阶级的宰割。所以，佛教成了北魏的国教。特别是从宣武帝以后，佛学大盛，佛寺林立。宣武帝在洛阳建造瑶光、景明、永明等佛寺。瑶光寺有五级塔一所，僧房一千余间。永明寺有僧房一千余间，养西域僧侣三千余人。同时，他还在地形险要的嵩山（今河南登封县北）建造一座闲居寺，华丽非凡。孝明帝元诩即位时，其母胡太后专权，荒淫无耻，坏事做尽，她相信佛法能减轻罪过，便不顾人民的死活，大兴土木以求福应。公元五一六年，在宫殿旁边建造永宁寺，又在伊阙（音缺 quē）口（河南洛阳）建造石窟寺，费时二十余年，动用了八十多万民工。永宁寺十分壮观，佛殿上有“丈八金像一躯，中长金像十躯”，佛塔高达千尺，百里外依稀可见。塔上“皆悬金铎（音夺 duó，大铃），合上下有一百二十”，金钉有五千四百枚。夜深人静后，塔上的金铎声可传闻十里之外。还建造僧房一千余间，用珠宝锦绣装饰得金碧辉煌。类似这样的佛寺

从京都洛阳到各州郡处处可见。《魏书》上有一篇《崔巨伦》传，说崔巨伦杀人逃跑后，“夜阴失道，惟看佛塔户而行，到洛。”足见当时佛户之多了。

北魏统治者竞相建造佛寺、佛塔，不仅消耗了不可数计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使百姓“疲于土木之功，金银之价为之踊上”，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，而且僧侣地主依仗着封建统治者的包庇与纵容，和世家豪族勾结起来，强行侵夺田宅和劳动力，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。仅京师洛阳，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，就有三分之一的民房被寺院侵夺。其他地方州镇的僧侣地主也是一样横行霸道，长安中兴寺就强占民田上百顷，用以种植水稻和果树。这样，无数自耕农丧失土地和房屋，流离失所，为寻求生路，便大批投奔寺院，出家当和尚了。当时，僧尼多得惊人。

众多小农为逃避赋役，纷纷涌向寺院，使朝廷剥削对象大大减少，收入也随之减少。面对国库空虚、财源枯竭的情况，孝文帝和孝明帝曾采取一些措施，强使因逃税入教的僧众还俗，限制僧人私自游涉民间，限制人民私自出家，对修建寺庙也加以必要的限制。但是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不但要借助佛教的力量来麻痹人民，加强统治，而且还想通过对